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3.02.001

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

谭绍江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205）

摘 要：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两个核心”和“四大方面”两个主要维度予以把握，其演变历程包括古代的“孕育与积蓄”期、近代的“激荡与磨砺”期和现代的“重塑与新生”期。在中国精神的发展历程中蕴含着与中国话语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生成逻辑。中国精神涵养化育了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造就其注重人文、凸显教化和推崇礼仪等特征；中国话语体系承载中国精神的绵延发展，固守民族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国精神创新前进。我们应在弘扬中国精神中营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机制，具体包括以爱国主义统领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全面推进机制、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重点突破机制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实践发展机制。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国话语体系；互动生成；守正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3)02-0005-08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的发展状态，是国家和民族自身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45-46可见，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与中国精神和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充分探讨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逻辑关联，有利于更好促进中国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守正创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事业。

一、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演变历程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珍贵精神成果，更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所必须的精神支撑。深入理解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演变历程，是理解把握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逻辑关联的必要前提。

（一）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

作为中华民族最鲜亮、最具特色的群体精神标志，中国精神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对此，可以从“两个核心”与“四大方面”两个维度予以充分理解。

收稿日期：2022-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课题一般项目（21JDSZK002）

作者简介：谭绍江（1981- ），男，湖北恩施人，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湖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精神的“两个核心”，就是以时间演变为基本线索，凸显中国精神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的两个核心内容来总结其主要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民族精神”表现出历史久远、源远流长的形成时间特点，“时代精神”更侧重强调的是其所形成的时间是最新、最近的时代。与此相应，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本身就是时间发展积累的结果。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3]人们需要千百年的时间方能积累起对自己祖国牢不可破的深厚情感，这与“民族精神”包含着历史久远、源远流长的时间特点相吻合。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创新最能代表当前人们生活中的精神精华。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矛盾中去解释。”[4]改革创新正是解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主要矛盾的最核心路径。

中国精神的“四大方面”，就是审视中国精神的整体面貌，展现中国精神在一切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主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5]从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的内涵来看，其充分包含了“两个核心”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要意涵。围绕着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这两个核心，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间以严密的逻辑构成了一个系统。伟大创造精神代表根源和起点，伟大奋斗精神代表路径方式，伟大团结精神代表保障依托，伟大梦想精神代表目标指引。我们民族的一切创造、奋斗和团结，最终必然汇聚到伟大梦想这个终极目标上。正是因为一直拥有伟大梦想，全民族才于顺境中毫不懈怠、勠力前行，于逆境中更敢于迎难而上、百折不回，不断造就新的壮举。

（二）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

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精神也具有相应的演变历程。这一历程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古代的“孕育与积蓄”期、近代的“激荡与磨砺”期和现代的“重塑与新生”期。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总历程中，古代社会所经历的时间最为漫长。古代社会既是中华民族的产生与形成期，也是中国精神的孕育与积蓄期。这一阶段的中国精神表现出何种样态呢？恩格斯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既肯定其立场的基本正确，也指出其层次相对较低。按照这一思路，也可将古代社会的中国精神概括为“朴素形态”的中国精神。一方面，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精神所包含的主要因素，不管是作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还是作为主干结构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在古代社会都已然产生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囿于古代社会相对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中国精神的主要内涵尚未得到更深层的淬炼与升华，其内在生命力尚未得到更深入的激发。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唯心史观、英雄史观的笼罩之下，人们往往习惯将社会中各行业精英人物当作中国精神的主要发现者、创造者与传承者。全民族中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群体并未真正觉醒，其中能够真正领略到中国精神的意涵并在生活中自觉践行者始终只是少数人，芸芸众生对中国精神都处于“日用而不知”[6]的情形。

中国的近代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有100多年历史。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从文明古国到“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7]悲惨境地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重新争得民族独立自主权的时期。中国精神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激荡与磨砺，表现为一种“反思形态”的中国精神。古代社会所孕育和积蓄的中国精神遭逢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受住了西方列强从军事、科技、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巨大冲击与压迫。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系统受到了极其

严厉的批判与拣选。许多在古代社会中人们习惯的精神感受（如“天朝上国”“万邦来朝”）被证明是虚幻、傲慢心态而被无情戳破，许多古代社会认为坚不可摧的信条（如“三纲”“礼教”）被证明是腐朽、糟粕之物予以彻底抛弃，许多古代社会认为毋庸置疑的道德精神（如“忠孝”“贞洁”）被证明内容复杂而需要筛选甄别。正是在近代这种迎接正面冲击和反面批判的磨砺之中，中国精神经受了反思，拥有了突破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这一时期的中国精神获得重塑与新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全民族首次实现了普遍觉醒。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8]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在精神上“被动”的情形所直接指向的是近代社会。更进一步说，这种“被动”也包含了古代社会的情形。虽然在古代社会全民族没有遭受过特别惨重的外族压迫，但是全民族中占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却始终处在被压迫地位。纵览古代历史，不管处于盛世还是乱世，普通百姓绝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9]的历史悲剧反复上演。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也就既包含中华民族摆脱外族压迫获得独立，也指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国家的主人。自那以来的新中国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之中，全体中国人民都能整体以主人翁身份自觉地为民族复兴、为自身命运忘我奋斗、顽强拼搏。“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1]这其中所迸发、凝练出的精神，既在某些要素上传承了民族曾经的优秀基因，又在层次上、全面性上远远超越了以往的水平和范围，是一种重塑与新生的更“全面”的中国精神。

二、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在历史上的互动生成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10]。此论断形象表达出中国话语与中国精神之间的逻辑关联。传统经典《周易》指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以此而言，中国精神正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形上之“道”，中国话语体系则是中国精神的形下之“器”。具体说来，中国精神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与源泉，涵养化育了中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是中国精神的主要承担者，承载护持着中国精神的传承发展。二者之间蕴含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生成逻辑。

（一）中国精神涵养化育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

历史上的中国话语体系建立并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特征，离不开伟大中国精神的涵养化育。中国话语体系所具备的注重人文特征、凸显教化和推崇礼仪等特征，正是在中国精神的演变中孕育生成。

中国精神发展出较为丰富的精神要素，孕育出中国精神契合的整套话语体系，催生出中国话语的注重人文特征。无论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爱国主义，还是反映整体精神面貌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都包含着追求人的美好生活、强调“人”的价值等显著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注重人文含义。“话语体系是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对自身存在和外部存在发展变化的系统思考与回应，话语体系反映着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表达程度。”[12]2古代中国人在思考回应自身发展问题时，表现出重视人们美好生活、突出“人”本身价值的话语体系特点。传统儒学话语体系是当时中国话语体系的主流代表，其虽历经先秦至明清两千年的变更，始终将人的德性修养放在中心位置，鼓励一切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主创造美好生活。这样的中国话语体系更符合当时一般人的现实需求，对于长期笼罩在原始宗教氛围下的周边其他民族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

中国精神培育出相对领先的核心价值与文化素养，不断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凸显教化特征。这种凸显教化特征体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话语体系对一个国家自身的意义在于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对内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话语体系对一个国家对外的意义在于其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对外产生的感召力、影响力。”[12]2 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中国话语体系对内的向心力、凝聚力冠绝古今。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自诞生以来没有断绝的文明。老子、孔子等思想家几千年前完成的著作，其文字内容及思想主旨仍能对今天的中国人产生智慧影响。诗经、楚辞、汉府、唐诗、宋词等距今不同年代完成的文学艺术作品仍能在今天中国人中广为传颂，成为中国人精神、情感的重要寄托。同样，世界文明发展史也证明，中国话语体系对外的感召力、影响力雄踞一方。中国周边各民族文化已然深深打上了中国话语的烙印。作为当今世界强国之一的日本，其文化在古代长期以中国文化为学习榜样。不仅日本文字是以汉字为模板改造而成，其精神文化传统也广受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朝鲜、越南等民族，在近代以前长期直接使用中国汉字、学习中国典籍、模仿古代中国制度，甚至还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其受中国话语体系的感召、影响可见一斑。

最后，中国精神持续迸发强大的思想与精神力量，造就了中国话语体系的推崇礼仪特征。这一推崇礼仪特征正是中国话语体系的话语权表现。“话语权不仅是说说话的事情，而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价值和主张在世界范围内的被认可和被接受的程度。”[12]80 近代以前，中华文明的话语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量有目共睹。中华文明所主张的“礼乐”文明广获赞誉。古代中国上至朝堂政治，下至黎民生活，都有细致入微的礼仪遵循。中华文明坚持的以“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为标志的和平外交广受认可。不管是实力相对弱小的文明初期，还是实力达到巅峰的文明中期，不管是处于分裂涣散的文明低谷期，还是处于王朝一统时的文明高峰期，中华文明始终做到了“以和为贵”。即便发生了对外战争也大体属于被动性的防御反侵略作战，表现出“先礼后兵”的风范。

（二）中国话语体系承载护持中国精神

中国话语体系由中国精神涵养化育而成，也发挥着承载护持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以话语体系的厚重与广博承载中国精神传统的绵延发展、以话语体系的坚韧顽强固守民族精神家园和以话语体系的开放包容推动中国精神创新前进。

中国话语体系的厚重与广博承载着中国精神传统的绵延发展。从话语符号形式来看，中国话语体系种类齐备，声音、文字、图形等样样出众、独树一帜。特别是汉语文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其存在本身已然是文明悠久厚重的标志。21世纪的中国人在学习汉字之时，仍能从中体验到公元前14世纪产生的甲骨文所保留传承的原初信息，堪称世界文化奇迹。其他如《周易》中的阴阳鱼符号、八卦符号，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龙图腾形象等，莫不以内涵深邃、玄妙神奇著称。从话语主题领域来看，中国话语内容立意深远、主旨鲜明，自古及今，历代中国人以追求创造人的美好生活为终极目标，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科技等主要领域都进行过广泛研讨。从话语体系的层次来看，中国话语体系层次丰富、雅俗共赏，既有严肃精密的思想典籍学术话语予人以智慧启迪，也有生动鲜活的小说、话本、曲艺等民间艺术话语带给人们多彩的生活乐趣。从话语体系的覆盖范围来看，中国话语体系所涉宽广，既拥有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也有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活力。

中国话语体系的坚韧顽强在全民族劫难中固守着最后的民族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并不在于其在发展中一帆风顺、毫无波澜，而恰恰是在几千年发展中历经各种劫难仍能不断浴火重生。这一人类民族发展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中国话语体系的坚韧顽强。每当波及全民族的劫难发生之时，中国话语体系坚固的价值便开始发挥成效。一方面，民族中总会出现一批先进分子，不惧危险、舍生忘我地守护大量珍贵典籍，保存最精华的中国话语记录。另一方面，百姓在颠沛流离、兵荒马乱

之中也没有忘记中国话语及其包含的中国精神。一旦战火灾荒稍有缓和，人们便开始着手重新整理话语体系、重振其中精神。特别是在近代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带给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最大的危机，不仅在物质层面劫掠摧毁，更在精神文化层面狂暴肆虐，几近形成“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分子在鼓舞人民奋起反抗、发起变法更张的同时，更注意发挥中国话语体系的固有优势，推动中国精神的新发展。林则徐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谭嗣同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孙中山写下“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毛泽东写下“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周恩来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这些都是用饱含深情与志向的中国话语来抒发爱国救国的壮志，激励起民族在绝境中的奋斗新生。

中国话语体系的开放包容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交往中推动中国精神的创新前进。古代中国长期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处于交流交往之中，中国话语体系也以其开放包容优势吸纳融汇其他民族文明之思想及话语的有益之处，在促进自身话语体系发展的同时，推动着中国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3]式的发展。近代中国在面临西方文化冲击压迫的情形之下，人们虽有过迷茫彷徨，但最终重新运用中国话语体系的开放包容优势，充分接纳、吸收借鉴外来西方文化的种种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精神的迭代更新。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抓住其中精神主旨，运用中国话语进行迅疾的翻译、介绍、阐释，将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开辟近代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建党一百多年来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革命和建设壮举，坚持、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先进的中国话语体系，同时也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精神谱系，使得中国精神发生了质的飞跃。

三、在弘扬中国精神中营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机制

中国精神的演变历程也正是中国话语体系的产生与壮大历程，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生成逻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新征程的今天，应在弘扬中国精神中营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机制。具体来说，应以爱国主义统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全面推进机制、以改革创新驱动构建话语体系的重点突破机制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实践发展机制。

（一）以爱国主义统领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全面推进机制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表着中国精神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恒久的凝聚力。通过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可以从增强全民族的话语优势自知、自信和自觉等方面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全面推进机制。

首先，注重增强全民族对中国话语体系及其优势的自知程度。中国话语体系是我们民族本身固有、具备相对优势的文化成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国人受制于自身“文化不自信”的错误思维，对自身话语体系及其优势的自知程度不尽如人意，反而盲目崇拜外国话语。如在大众话语中，“土气”（“乡气”）与“洋气”的二元对立思维极具影响力。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中国”[14]来描述阐释传统中国的生活与文化特点，久而久之，“土气”“乡气”便逐渐成为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话语的一种共识。这种评价单独来看似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和“洋气”放在一起比较，则“土气”“乡气”便立刻成为落伍、粗俗、低端的代表话语，而“洋气”反过来成为时尚、精致、高端的代表话语。在这种话语格局之下，很多人便下意识地将“洋气”所蕴含的西方文化、西方话语因素看得很高端，而将“土气”“乡气”所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本土话语看得很低端。在这种环境下，更多话语方面的“怪现象”层出不穷。许多颇有声望的中国本土品牌使用的却是看上去像外国品牌的名字，例如美特斯·邦威、森马、奥克斯、鸿星尔克、TCL等。反而一些来自欧美地区的国

际品牌却使用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例如宝洁、飘柔、夏士莲、舒肤佳、奥妙、奔驰、路虎等。种种情形提醒我们，亟需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中进一步扩大中国话语体系在全民族成员中的自知程度，方能尽快刹住这种怪诞的话语风气。

其次，要树立和强化全民族的中国话语体系自信。只有通过不断增强全民族的中国话语体系自知程度，方能进一步树立和强化全民族的中国话语体系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5]339中国话语体系内在蕴含着文化优势，建立文化自信也必然包括建立起中国话语体系自信。前文有述，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每个时期，中国话语体系的贡献都不曾缺席。当中国历史文化走上高峰时，中国话语体系为其广为传播、增色添辉。当中国历史文化进入低谷时，中国话语体系为其固守阵地、力挽狂澜。如此种种经历，都应在建立中国话语体系自信时予以着重强调。我们既不能极端夸大中国话语体系而贬低其他民族文化话语的价值，防止“中国话语自大”；更不能极端藐视中国话语的优势而一味崇拜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话语的地位，防止“中国话语自卑”。

最后，注重激励全民族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自觉运用。通过增强全民族对中国话语体系的自知程度，逐渐破除国人对中国话语体系的一些“误解”只能解决相对表层的问题，更进一步是要激励全民族的主体能动性，在各个领域自觉运用发挥中国话语体系。就宏观层面来看，国家相关部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广播电视和现场活动等传统媒介形式，正面引导鼓励全体国民热情投入中国话语体系的运用之中。从微观层面来看，全体国民在工作、学习、生活的种种场合下也应有高度的中国话语体系自觉意识，结合自身具体实践增加运用中国话语的时机，强化中国话语体系。特别是在对外交往时，尤其注意摒弃将外来特别是西方话语高看一眼的不良习惯，保持一种“平视”的心态合理运用中国话语，不卑不亢地展现自身的中国话语体系。

（二）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重点突破机制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代表着中国精神显著的时代特征与蓬勃的创造力。弘扬改革创新时代精神，有助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重点突破机制。我们应在改革创新精神指导下，做好高质量的中国话语创造、不懈提升中国话语投送能力，以此重点突破“西强我弱”[15]197的话语格局。

首先，做好高质量的中国话语创造工作。话语质量既取决于话语内容，也取决于话语背后所代表的价值观及其事实。从话语内容创造来看，要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善于将我们的伟大实践成就转化充实为新的中国话语内容，做到“言之有物”。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6]这启示我们，话语作为思想观念的载体，其最有意义的内容必然是对社会实际的充分反映。我们在现实中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实践成就，正是创造优秀话语内容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从话语效果建设上看，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将话语共性与个性结合，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10]。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导我国外交人员巧妙翻译中国经典作品，取得了空前的话语效果。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我国外交部准备了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中国歌剧电影向欧洲观众展示中国形象。但是，如何能迅速吸引外国观众让外交部人员犯难。周总理给出了建议，让外交部人员在请柬上用英文写出“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再在放映前用三分钟英语做简单说明。外交部人员按此办理，其后在电影放映时果然取得成功[17]。这表明，将中国话语特点与其他文化话语特点的合理结合，是通过良好话语效果促进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有效方式。

其次，不懈提升中国话语投送能力。话语投送与话语创造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高质量的话语创作本身就要考虑投送效果，而高水平的话语投送则是不断创造高质量话语的必要保障。从投送形式来看，亟待实现以传统话语形式为主向新型话语形式为主转变。当前我们所擅长的主要还是相对传统的形式，如上文所说的通过外交场合播放电影、文化表演开展有效投送已经成为常态，但对互联网时代下更新的话语投送形式仍处于探索之中。从投送规模范围来看，有待弥补与西方媒介巨大的差距。我们对外的话语投送在“点对点”式投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西方媒介铺天盖地、全线开花乃至“无孔不入”式的话语投送规模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从投送组织来看，亟需实现更科学的整合融合。相比西方媒介“闻风而动”的协同状态，我们的话语投送大多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没有将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官方媒体、民间自媒体充分融合起来形成合力。

最后，重点突破“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仍然在唱衰中国，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15]197可见，“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就是突破当前“西强我弱”话语格局要化解的重点问题。要有效化解“有理说不出”，就应加强话语供给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10]在透彻把握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有机统一结构的基础上，鲜明展现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这就是当前话语供给建设的核心架构和科学路径。平心而论，一旦中国话语在话语体系建设上达到与西方话语对等的水平，更具有真理性的“中国思想”“中国主张”获得更多他国人民深入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固有优势必尽显无疑，为全社会提供充足可靠的中国话语体系供给。要有效化解“说了传不开”问题，主要需要通过加强话语传播渠道和载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18]我们应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原则指导下，构建更合理可用的话语框架、丰富话语传播载体、精心设计话语传播策略，不断改革创新、协同发力，促进中国话语体系不断突破当前的国际话语格局。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话语体系守正创新的实践发展机制

历史上的中国话语体系长期以来受人瞩目，但仍需要通过弘扬中国精神促进其进一步崛起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15]351。我们在今天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精神的弘扬，也是引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实践发展的必要途径。“国际话语权的获得，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制高点：一是道义的制高点，二是真理的制高点。”[19]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实践发展机制，应从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两方面来体现。

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有助于引领中国话语体系占领真理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直接回答的是当前中国的价值追求，但其内核却包含着对人类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传承和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展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所构建的中国话语体系，拥有无比坚实的话语基础和鲜明的话语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10]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背后之“道”。这一“道”所包含的真理是对全人类发展进步的深刻关切，是对全人类都面临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问题的科学回答。相比之下，西方话语内核中所包含的是资本主义无休止扩张和压迫人民的“剥削有理”逻辑，是西方国家优先发展的“西方优越”逻辑，明显违背人类整体发展前途。但他们却在话语外表构建上做足了包装功夫，因而得以在一段时间内占据强势地位。与此相应，习近平总书记所谆谆告诫的“引人入胜”“循循善诱”等方式正切中当前话语建设的关键命门。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有助于引领中国话语体系占领道义制高点。仅从主要话语概念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中有许多与西方话语概念相近，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正是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中的核心内容。但从实质来看，由于西方社会从根本上秉持的是资本至上立场，使得他们并没有真正将以上众多美好价值观落到实处，而大多停留于话语宣传的表层，带有极大的虚假性。反之，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就能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美好价值观变成老百姓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获得与幸福。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20]241“如果全世界都能采用这种生活方式，就会感到幸福快乐”[20]14。诚如其言，高质量的中国话语体系创造并非指表面上的说话声音更大、更热闹喧哗，而是能真正践行话语所承诺的价值导向，满足人们合理的现实需求，营造起更欢乐祥和的世界秩序。“话语权需要由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传播来实现，但话语权的根本力量还是来源于话语权背后的事实本身。”[12]81以此来看，表面上掌握更多话语权的西方话语，因其圆满精致的话语内容与问题百出的社会事实相背离，将越来越失去道义上的地位；而中国话语体系则将以扎扎实实的事实成就获得社会道义制高点，彰显出更显著的优势。

综上，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的核心精神力量。中国话语体系既源于中国精神，又是中国精神发挥效能的重要载体和必要路径。充分理解把握中国精神与中国话语体系的互动生成逻辑，在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中营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机制，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提供更强劲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34-235.
[3]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8.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5] 习近平.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
[6] 洪应明.菜根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268.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9] 赵传仁.诗词曲名句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427.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3.
[11]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26.
[12] 贺耀敏.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
[13] 杨天宇.礼记译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03.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
[17] 李亚平.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艺术[J].党史纵览，2010（6）：4-9.
[18]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
[19] 赵士发.毛泽东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贡献[J].毛泽东研究，2019（2）：88-94.
[20] 罗素.中国问题[M].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颜　莉）